

# 歷史學家的天真

● 張寶明

最近，從《二十一世紀》1996年10月號上讀到美國杜克大學德利克教授〈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一文（以下簡稱〈兩個文化革命〉），其中有些問題頗能從思考角度上給人以學術啟迪，亦有一些問題與筆者意見相左。這裏，我不揣冒昧，摭拾其中一二，算作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也可以說是對論題的延伸和發揮。

〈兩個文化革命〉的作者自始至終都在為文革尋找「新意」之證據。我們暫且不說「文革以打倒舊文化為目標」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自身規律，令人尤感不安的是：（一）目標不合理怎麼辦？（二）為達到目標能不擇手段嗎？（三）手段和目的之關係可以偶合嗎？

## 一 革命豈能「放之四海」？

讀〈兩個文化革命〉，文意告訴我們，作者自始至終都在為文革尋找「新意」之證據。但要達到德利克先生宏論的目標，就要有一定的手段，使這一判斷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語言結構上都無可非議。鑒於連作者都不得不承認文革目標是一個美麗、遙遠、無從實現的「烏托邦」，所以，我們就把「回應」的重點放在先生所說的「手段」上：儘管文革的理想沒有達

到，但文革所採用的方式卻不失為一種具有意義的手段①。

文革創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於竭力阻止革命「非激進化」。……文革以打倒舊文化為目標，但卻以質疑共產黨官僚體制的新「革命」文化為手段。……

想要達到美滿生活必須有適當的學習和教育方式。……雖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實這個社會構想，但〔這些政策〕卻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為毛後時代政策的成功作出貢獻；即以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塑造有才幹的民眾，解決地方問題並參與地方發展。

這裏，我們暫且不說「文革以打倒舊文化為目標」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自身規律，令人尤感不安的是：（一）目標不合理怎麼辦？（二）為達到目標能不擇手段嗎？（三）手段和目的之關係可以偶合嗎？

首先，凡事總要有一個既定目

標。但「三思」之後，並非有了目標就一定可以「萬事大吉」地為之奮鬥，因為一個愚昧無知的目標遠遠要比沒有目標可怕得多。儘管文革目標看起來崇高美滿，但在這種慷慨激昂的「高呼」背後，畢竟是一種完全非理性主義的「跟着感覺走」。「合情」的東西不一定「合理」。共產主義作為一幅藍圖描繪出來固然好，也令一些人尤其是工農大眾嚮往至極，但若真要踏着「大幹三個月」的步伐進入，不是痴人說夢，就是自欺欺人。看來，不負責任的目標只會出現「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情勢。

其次，就手段而言，它是達到目的不可或缺的方法。換言之，沒有手段就永遠談不上「實現」。但這裏，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為目標能「饑不擇食，急不擇路」嗎？回答是否定的。還是讓我們用著名劇作家陳白塵先生在「牛棚日記」中的記錄來詮釋其謬吧：當《石達開》被冠之以「影射紅軍、咒罵紅軍」之罪時，他就「罪有應得」了。當然他只有聽天由命、束手就範的份。因為，他若「申辯」，將會被說成是「反對黨中央」；「不申辯，也是欺騙黨中央」！何去何從？「罪人」不得不在兩難的邏輯怪圈中被「踏上億萬隻腳」。

第三，關於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眾所周知，一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就是一部（文化）啟蒙與（政治）革命兩輪舟車並駕齊驅的歷史。

應該說，「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中一個十分嚴肅的學術話題。它與自由主義的改良構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生生滅滅、時顯時隱、此起彼伏的兩根主線。遺憾的是，這也是一

個啟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直處於兩難的關係課題。從孫中山與嚴復1905年在倫敦的那次「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對話開始<sup>②</sup>，到戊戌後期的「保皇」與「革命」之爭，再到「五四」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以及90年代的關於「解構」抑或「重建」之人文精神的討論<sup>③</sup>，無不展示着一個深刻的內涵：兩者的緊張只發生在手段和方法上，它們在強國富民的現代化目標上並無二致。二十世紀即將在彈指之間過去，但它卻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就「改良」與「革命」二者而言，將手段流於目的或將目的淪為手段都不盡人意。要麼代價沉重，要麼一事無成。兩者不應只有否定、排斥、對立，而應處於一種互補、對應、制衡的狀態。

在這一意義上，過去我們對自由主義的改良顯然有待復議。但我們應小心的是，在給自由主義者重新加冕時，切勿忽視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而將「革命」不分場合、一概而論地視作一截可有可無的盲腸。這也是筆者既不願把自由主義看得過於可怕而要猛烈批判、小心提防，也不敢苟同「退而結網」、「告別革命」的原因。「革命」固然不能一勞永逸的「告別」，但若是不合時宜的「作亂」，我們寧可其無。改良為革命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意義資源，革命卻解決了改良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回到本題，還要面對德利克先生的命題，試問文革的「反官僚主義」目標本是政治性的，這和冠以「文化」之名的「革命」有甚麼必然的聯繫嗎？實際上，文革的打倒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遠遠超出了德利克所說的「文化領域」的革命。

「革命」固然不能一勞永逸的「告別」，但若是不合時宜的「作亂」，我們寧可其無。試問文革的「反官僚主義」目標和鎖定的「文化」領域的「革命」對象有甚麼必然的有機聯繫嗎？

## 二 兩段革命能「情同手足」嗎？

〈兩個文化革命〉的作者用了「曲筆」來暗示其觀點：「我故意給這問題以抽象和思辯性的答案，盼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有關歷史記憶的討論，但這答案也作出承諾，把有關中國革命的批評從現今遭知識界貶斥而湮沒的境況中挽救出來。」不知是連作者自己也對其觀點感到突兀、不自信，還是真的「存心故意」。但不管怎樣曲折委迤，我們都能悟出全文的脈絡：「文革表達出和中國革命史同樣悠久的主題」，人們沒有理由將兩段革命分開。倘若沒有誤讀原文的話，這乃是筆者和德利克先生分歧的根本癥結。

其一，大凡真正構成革命內涵的歷史事件都有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對象，而且是兩個不同意識形態、不同階級間的對壘。對中國民族民主革命

的反帝反封建，我們有目共睹；對國共兩黨的流血決戰，也一覽無遺。這些革命與文革的「革命」能相提並論嗎？進一步說：文革的革命對象是虛設的「假想敵」。紅衛兵只不過憑藉盲目崇拜的非理性，砸碎了大批寶貴的歷史文物，焚毀查禁了大量傳統文化書籍。儘管紅衛兵小將的革命激情一浪高過一浪，但遺憾的是，他們大好的青春卻虛度了。

文革時最流行的歌曲〈社會主義好〉，其中有一句是：「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革命還將作為舊時代的封建主義埋葬了，國民黨「殘餘」也被驅逐到台灣。這就使得習慣了革命的人們對這一手段情有獨鍾，真的認為它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革命搞好了，生產就自然而然上去了」，這些語錄和標語本身就蘊含着繞不過、剪不斷的「革命」情結。文革中的「革命」往往是

既然德利克先生也不能不承認文革的「反精英主義」性，那麼文化的創新是應該力倡「精英主義」的化大眾，還是反精英主義的大眾化呢？事實上，文革的「破舊立新」不但沒有能「破」，反而使封建主義殘渣浮起，大行其道。



對一部分人的迫害，它所造成的貽害，至今仍然未消除。1976年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動亂。從這一意義上說，將文革定性為一場禍國殃民的「內亂」實為切中肯綮。

其二，以德利克先生之見，文革之所以能和中國革命同日而語，一個根本前提是：「共產黨內激進派……決定把新一輪的革命鎖定在文化領域。」這裏，我們不免發問：文化能革命嗎？「五四」文化革命和文革能相提並論嗎？對此，我有另文專論，這裏不再贅述<sup>④</sup>。問題在於，既然德利克先生也不能不承認文革的「反精英主義」性，那麼文化的創新（文革的術語是「破舊立新」）是應該力倡「精英主義」的化大眾，還是反精英主義的大眾化呢？事實上，文革的「破舊立新」不但沒有能「破」，反而使封建主義殘渣浮起，大行其道。

其三，「革命」作為一種急風暴雨式創新的手段更能蠱惑人心，形成「百萬工農齊踴躍」之勢。而文化本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傳統，它的最大悲哀就在於，隨時有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替罪羊」。在中外歷史上都可以看到，將「政治」（權力之爭）的「文章」拿到文化領域去做，是政治陰謀家玩得爐火純青的把戲。如果我們不健忘，文革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其中「要文鬥」似乎符合文化革命，但實際情況卻是大規模武鬥造成無辜民眾傷亡。對此，歷史學家切不可「霧裏看花」。

我無意說外國的歷史學家不能理解文革真相。我只是想強調，德利克先生在〈兩個文化革命〉一文中所說的文革，與真實的文革相去甚遠。實際上，中國十年動亂和蘇聯斯大林專政的大清洗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們都

在「大事業」的命義下，要求某些人接受反革命的罪名<sup>⑤</sup>：

當時的逼供經常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也就是說（被誣者）只有承認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才能證明自己是忠於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這就製造了一種怪圈，為了「大事業」的需要，你必須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而當你為了「共產主義事業的利益」而接受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來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之後，你的腦袋就必須接受專政的子彈，這真成了頗有特色的「黑色幽默」——你不承認自己是法西斯走狗，那就證明你是法西斯走狗了！在兩種情況下，你都應當作為法西斯走狗而被處決！布哈林最終被迫接受了這種荒謬的邏輯。

布哈林被迫接受的邏輯，也正是文革中千千萬萬受害者被迫接受的邏輯。這也正是今天的俄國人和中國人難以忘卻的。

在中外歷史上都可以看到，將「政治」（權力之爭）的「文章」拿到文化領域去做，是政治陰謀家玩得爐火純青的把戲。對此，歷史學家切不可「霧裏看花」。

### 註釋

① 德利克著，林立偉譯：〈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所），1996年10月號，頁6、8。

②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525。

③ 〈面對文化現實，解構抑或重建〉，參見《社會科學報》（上海），1994年7月28日，第1版。

④ 參見拙著：〈失去砝碼的天平——就本世紀兩次「文化革命」問題致林毓生教授〉，《青年思想家》（濟南），1993年第4期。

⑤ 鄭異凡：〈「大事業」情結〉，《讀書》，1995年第12期，頁76。

張寶明 歷史學博士，現任鄭州航院圖書館館長。